

俞平伯与梅兰芳

的君子之交

王玉蓉



文学家俞平伯(1900—1990)欣赏梅兰芳(1894—1961)的表演艺术,戏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对俞平伯探讨戏剧艺术的文章产生共鸣,给予称赞。他们的君子之交也充满艺术气息。

俞平伯初次观赏梅兰芳的表演艺术是在1916年初,梅先生在北京东安市场吉祥戏园首演古装京剧《黛玉葬花》之时。梅先生饰演林黛玉,美妙香艳演贾宝玉。那时,俞先生正在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读书,为照顾他的生活,其父母也从苏州移家北京,居东华门箭杆胡同。因距离吉祥戏园甚近,“得往赏场”。梅先生曾笑说:“这出《葬花》,是我排《红楼》戏的第一炮。观众过去从来没有看见过在舞台上的林黛玉和贾宝玉,都想来看一下。因此叫座能力是相当够理想的。”当年,上海开新书局还出版了《黛玉葬花曲本》,这也是梅先生在艺术上不断追求创新的体现。他说:“我自己每演《葬花》,总感觉戏是编得不够细致的,可惜场子太瘟了。”就是这出《黛玉葬花》给俞先生留下深刻印象,为他数年后从事《红楼梦》研究做了铺垫。

俞平伯与梅兰芳相识于1957年。那一年的6月22日,北方昆曲剧院在北京文化宫礼堂举行建院典礼。韩世昌任院长,白云生、金紫光任副院长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毅,文化部部长沈雁冰,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,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、副主席梅兰芳等出席典礼并致辞。梅兰芳时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、中国京剧院院长。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的俞平伯,作为北京昆曲研习社社长应邀出席庆典,致辞《祝北方昆曲剧院建院之喜》,并赠送锦旗。俞、梅二人就是在这一重要场合得以晤对并竟相识恨晚的。在这次庆典活动中,俞平伯观赏了梅兰芳与韩世昌、白云生合演的昆曲《游园惊梦》。

同是1957年,俞平伯写作了《杂谈(牡丹亭·惊梦)》一文,发表在当年8月《戏剧论丛》第3辑。文章从昆剧《牡丹亭》剧情的发展,通过人物的性格、心情、环境等诸方面的分析,指出《游园》是《惊梦》的一部分,不宜独立的。认为《惊梦》的剧情有“小说的本色”,不可“深求核实”,“但情节上有些矛盾也总是事实”。他用多种版本曲谱,探讨了《惊梦》一折从古至今在唱演方面修改的利与弊,并谦逊地说,短文“只讲到一些文词和唱演的关系,供戏剧界同好的参考”。

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,俞平伯即开始研究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传奇剧本,曾“读之数十遍,其中数折又歌之数百遍”,细细体味剧情之妙,撰写了数万言的长文《牡丹亭》,称其为“曲中之翘楚也,善以不实为真者也,善以凄迷如烟絮、愁艳如花雨之笔,抒儿女之情者也”。1957年春,俞平伯与华粹深以“一面保存、一面改革”的宗旨,将原本五十五折的《牡丹亭》剧本,缩编为八场。以杜丽娘、柳梦梅恋爱故事为主,简化了一般的情节,保留了原作美妙缠绵的风格,并组织北京昆曲研习社成员排演。1959年10月,他们改编的昆剧《牡丹亭》,在长安大戏院参加了国庆10周年献礼公演。由此可知,俞先生的《杂谈(牡丹亭·惊梦)》一文就是在研究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。

再说梅兰芳先生,不仅是卓越的京剧表演艺术家,他对昆曲也素有研究。初学北昆,借鉴南昆,博采众长,对读曲、身段均下过大功夫。他深知昆曲的词句深奥,曾向罗瘿公、李释戡等功底深厚的老先生请教,请他们逐字逐句讲解曲文的意思。1915年,他开始演出《游园惊梦》。在数十年的演艺实践中,他对《游园惊梦》也是不断修改完善,使之更符合剧情,更臻于完美。《游园惊梦》也成为梅先生久演不衰的代表剧目。1959年冬,梅先生与俞振飞、言慧珠合作演出,将《游园惊梦》拍摄成彩色电影,于1961年元旦上映,把炉火纯青的表演艺术留传给后世。梅先生所做与俞先生所做无异曲同工之妙。

1960年5月,梅兰芳在中国戏曲学院梅兰芳表演艺术研究班上,向各地区、各剧种的戏曲演员讲授表演艺术经验时,谈到阅读俞平伯文章《杂谈(牡丹亭·惊梦)》的感想,他说:“前天(5月12日),徐凌云先生和俞振飞同志给我看了一个文稿,是俞平伯先生前几年写的有关《游园惊梦》的几个问题,说得很有道理。其中对杜丽娘换衣的问题,他也不赞同穿破上场,这一点我在前面谈过了。还有,游园回房的动机,汤显祖原著规定是由杜丽娘发起的,后来的流行曲谱给春香加了一句念白:‘留些余兴,明日再来耍子吧。’就变成春香的主动了。他认为这一改动对剧情有损害,春香没有羞够,不会主动回去;杜丽娘游园伤感,意兴阑珊,才无心留恋。这个说法我同意,以后再演,我准备在念完了‘提它怎么之后,加念:‘回去罢。’删去下面春香加的那句念白,接唱尾声曲子,这就看出谁是谁的主动者。他还说,‘遍青山啼红了杜鹃’,本来是一句,不应该把它割开来做戏。这话很对,今后我要把这句的身段都改在下场台角做。’由此可见梅先生的学术深思、虚怀若谷,能及时吸纳俞先生的见解,立竿见影完善自己的表演艺术。

兰芳表演艺术研究班上,向各地区、各剧种的戏曲演员讲授表演艺术经验时,谈到阅读俞平伯文章《杂谈(牡丹亭·惊梦)》的感想,他说:“前天(5月12日),徐凌云先生和俞振飞同志给我看了一个文稿,是俞平伯先生前几年写的有关《游园惊梦》的几个问题,说得很有道理。其中对杜丽娘换衣的问题,他也不赞同穿破上场,这一点我在前面谈过了。还有,游园回房的动机,汤显祖原著规定是由杜丽娘发起的,后来的流行曲谱给春香加了一句念白:‘留些余兴,明日再来耍子吧。’就变成春香的主动了。他认为这一改动对剧情有损害,春香没有羞够,不会主动回去;杜丽娘游园伤感,意兴阑珊,才无心留恋。这个说法我同意,以后再演,我准备在念完了‘提它怎么之后,加念:‘回去罢。’删去下面春香加的那句念白,接唱尾声曲子,这就看出谁是谁的主动者。他还说,‘遍青山啼红了杜鹃’,本来是一句,不应该把它割开来做戏。这话很对,今后我要把这句的身段都改在下场台角做。’由此可见梅先生的学术深思、虚怀若谷,能及时吸纳俞先生的见解,立竿见影完善自己的表演艺术。

1961年的一天,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萃华楼饭庄,俞平伯与梅兰芳不期而遇。交谈中,梅先生对俞先生的《杂谈(牡丹亭·惊梦)》一文给予很高评价。探讨艺术的学术文章能够得到内行艺术家的称赞,俞先生深感欣慰。知音难觅,欣喜之余,他拟写了赠送梅兰芳的联语:“腊月六街尘,为观黛玉葬花剧;逢君一杯酒,却说游园杜丽娘。”对联记述了二人的萍踪、鸿迹。联语拟好后,未及写赠,便得到梅先生因心脏病去世的噩耗,“君之艺名千古”,在俞先生心中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俞平伯与梅兰芳的交往,留下的文字记载极少,但弥足珍贵。追述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,由衷纪念戏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诞辰130周年。

题图:梅兰芳在昆曲《游园惊梦》中饰杜丽娘

满庭芳

第五二四八期

起的宝葫芦摆件,玲珑精巧,这寓意福祿祥和、子孙满堂的“吉祥物”,深受大家喜爱,常常供不应求。她用珠子串的爱莎公主发箍,更是小丫头们的最爱。我笑赞:“你那一屋子琳琅满目的小猪、长颈鹿、小粉兔摆件,还有中国结和十字绣,都可以开一个‘彩儿DIY作品展’了,样样都是绝美的民间艺术品。”

青是我小学时的劳动委员,当年与丈夫一起北漂去打工,因喜爱孩子又参加过系统培训,很快她就成了极为抢手的“金牌月嫂”。考虑到老人年迈孩子幼小,赚到第一桶金后,她便产生了回乡创业的念头。她先小打小闹,搞了一个小型的农副土特产作坊,还学习了如何做电商,网上与实体同步销售。创业起步阶段极为艰难,亲戚朋友都觉得她在瞎折腾。逐渐地,她发往全国各地的快递越来越多,这几年她又拍小视频直播带货,因货真价实又诚信老实,她的生意越做越好。村里出外打工者闻讯后,纷纷返乡进入她的工厂上班。昔日冷清的村庄又开始热闹起来了。青也经常去探望村里的老弱病残者,还在厂里优先安排合适的岗位给生活困难的残疾人。

发小儿们为生活奋力打拼的干劲,让我想起一位自媒体作者说的一句话:“你哪怕身处不拂晓的夜,也永远要有不言弃的心。”我的发小儿们用汗水与辛劳,找到了自己的诗与远方,她们怀揣梦想,用劳动创造了美好生活。

题图摄影:李磊

个农民的儿子心中。梁斌先生的一生,在喜雨中劳作,在风雨中战斗,他把雨写进故事里,自然也会把雨引到画笔下。他的雨朦朦胧胧,潇潇洒洒,把花、叶、世界和人都包裹起来,构成一幅美丽的梦境。先生画过日,无论是旭日还是落日,都是火一般红彤彤的,衬得满纸光芒,耀人眼目。在一幅描绘海上日出的画幅中,他题道:“十月廿五日,伟大的早晨。太阳从东方升起。丁卯冬月于津门,梁斌。”丁卯年是1987年,这一年的10月25日至11月1日,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,本次会议的主题正是加快和深化改革,由此可见,梁斌先生画中的红日照耀出的正是中国美好的未来。

浪漫主义的表现

梁斌先生的绘画是有来路的。“十二岁考入县立高小,乃有图画课,开始临摹铅笔画,画静物及景物”“最有趣的是临摹马徐维邦的风景画,直到现在,才明白他是学石涛的”。1960年,他接受医生的建议,开始重拾画笔,携友逛古籍门市部,看碑帖,看书画。“有时也到北京住几天,逛和平画店,荣宝斋、庆云堂、宝古斋”,又时常去“故宫绘画馆、展览馆,浏览古今名家书画”,并且逐渐接受了明清书画作品,尤其扬州画派、吴昌硕和齐白石等。从具体的绘画实践上,梁斌先生也偶尔进行临摹。比如,在一幅墨梅上他便记录道:“己未夏初,与一夫同游艺术博物馆,观扬州八家画展,兴甚浓,漫步归家画此,疑冬心笔意。”在另一幅题为《花有语》的作品上,他又题道:“常临之不知有相像处否。己巳孟春。王个移先生盛荷一幅悬之壁间,甚爱之。一九六六年文革前夕居北京接得上海老友。”可见古人及画友为他提供了一定的帮助。

然而,梁斌先生的绘画更使人惊异的是其大胆独造之处——他画雨,满纸淋漓,似从天降,而为古人所无,却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;他画山川、峡江,常常不以透视比例安排景物,修枝、巨果与阵鸟、兔丹交相掩映,却使人激赏于万物之丰饶。这正是一种彻底的浪漫主义情怀,也显示出了艺术家的个性,对此,他自谓:“你画你的,我画我的,我画得不好,还是我家笔墨”,并认为绘画“和写文章是一样,写不出自己的风格,也就没意思了”。可见正是这种对于创造性的自觉,使梁斌摆脱了限于传统禁锢的风险,从而一而再再而意在笔先、浪漫纵横的卓然画境。

梁斌的绘画,是一位革命艺术家的心曲。形象、笔墨构成的音符都跳荡在那一颗搏动的文心之中。这颗文心,属于那位保定二师学潮的运动领袖,属于那位左翼作家联盟的进步青年,属于那位山东省立剧院的先鋒编剧,属于那位新世纪剧社的社长,属于那位冀中文联和干校干部,属于那位新武汉报社的领导,属于那位写出了中国革命史诗的伟大作家……这颗文心里面,浓缩着梁斌深厚的文学积累和艺术修养,更充盈着一位爱国者对祖国和人民无限的热爱。当读者们阅读梁斌的画作,便能够借由形象、笔墨感受到那热烈的能量,并随之涌入那颗搏动的文心,和上一脉恢宏热烈的心曲。在这心曲里,重新认识梁斌;在这心曲里,感受那如春风一般的人格魅力。



牛棚村小景(中国画) 梁斌

劳动也有诗和远方

李仙云

我10岁便随做警察的父亲离开了桑梓地,去往外地读书。人生恍若萍浮徙转,几十年后,当儿时的发小儿几经周折,终于打听到我的联系方式时,电话接通的一刻,一句“伙儿(家乡方言,对友人最亲切的称呼),终于找到你了,想了你几十年”,暖得我热泪盈眶。人在童年建立起的感情,是会像胎记一样,终生都铭记的。

想起那,耳畔就会飘来那首歌“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,长得好看又善良,一双美丽的大眼睛……”记忆中雨温柔细腻,是那种妈妈宠溺姐姐疼爱的娇娇女。几十年后一聊不由得惊叹,岁月竟让她脱胎换骨,成为庄稼地里的汉子。丽的丈夫是个焊接工,常年在外打工,她养育一对儿女,耕种十几亩田。家乡一带被称为“中国花椒之乡”,种植出的花椒色艳粒大,麻味纯香。她也起早贪黑,经营着几亩花椒地。每次与她联系,不是在田里忙碌着,就

天津水上公园雨中瞥见的清荷、旧友在自己病中送来的手种的石榴……无不于先生笔下展其情采,叙其端由。可见,丰富的人生经历为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宝库,而山川花草无不为作者记忆的凝结和情感的寄托。由此,也可想见梁斌先生在笔墨淋漓中那饱满的激情和乐趣,并由此被这些作品进一步震撼和感动。

象征主义的提炼

在梁斌先生的绘画作品中,存在着一些反复出现的意象。如太行山、白洋淀、荷、梅、雨、日等,由此可见作者的青睐。太行山与白洋淀是作者革命生涯中久经之地,这里的自然风物给予作者最深刻的印象,作者也容易对此具有更为深厚的感情。然而,作者反复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,其实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。比如,作者多次以狼牙山五壮士殉难处为题进行创作,在其中的一幅《狼牙山》中,作者题道:“一九四三年太行山反扫荡最后一班人掩

走过激情 永远浪漫

——读梁斌绘画有感

马驰

护退却,被敌人包围,五壮士从此悬崖跳下殉国,万古流芳。”可见对英雄的敬仰与缅怀。在《醉墨写太行》一幅中,作者又题道:“醉墨写太行,红枣满山岗。路人树下过,吃饱也无忧。”展现出戎马倥偬中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在一幅大写意荷花作品上,作者写下:“千年难忘的白洋淀。写播火记的主要人物李霜霞的家乡。”另一幅描绘白洋淀秋色的巨大画幅上,作者用细密小字题写了“纪念一反扫荡五十一周年”的长跋。可见,太行山与白洋淀已经借由作者的革命经历而与其革命信念融合为一。

对荷、梅、雨、日的选择也是异曲同工。荷、梅历来是中国文人偏爱之物,因其性情高洁,常被多情文人用来自比。梁斌先生在革命工作中奔波南北,也曾留意观察过。他在白洋淀“每天清晨必至淀边,观看荷花,雾中之荷,扑朔迷离,雨中之荷,萧萧有声”。在武汉工作时,见到梅花心生喜爱,后来便“意追白梅”。然而,先生笔下的荷花与梅花,并未全追古人旧迹,而是“充满激情、希望与生机”。在一幅《鱼戏新荷》上,先生题道:“昔日曾游洋水边,少年洋上走玉莲。白发做完南柯梦,改革开放又一年。”在回顾自己革命生涯的同时,抒发适逢改革开放开启人生新征程的豪迈。写梅之作则常以《独占春光》《东风初度》等为题,可见先生实是以荷、梅作为自己旺盛生命力的象征。

梁斌先生喜欢画雨,也喜欢画红日。他的雨景常以荷花、芭蕉为主形象,再以浓淡墨点铺洒其上,观者阅之,似闻其声。这雨还有春雨、夏雨、夜雨、梦雨之别,然而似乎总是能引起作者的喜爱。即便是“大雨骤下”,作者不得不“撑伞而行”,也仍然只会发出“雨中景另有一番不同”的赞叹。其实,先生喜欢雨的原因并不难猜。雨滋润万物,是农民最期盼的天象,这种思想自小扎根在梁斌这

梁斌先生诞辰110周年 (1914.4—2024.4)



记载》的发表,成了他的学术成名之作。

马可·波罗是有着世界影响力的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。缘于其游记的介绍,北京卢沟桥又被叫做“马可·波罗桥”,中国面条演变为威尼斯一道美食,称“马可·波罗面条”。在那部游记上写满批注的哥伦布,带着西班牙国王致中国皇帝的信件,扬帆远航,阴错阳差地发现了美洲大陆。然而,尽管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有一门学问叫“马可·波罗学”,但马可到过中国吗?其所记是亲历目睹还是道听途说,却一直是个问题。在威尼斯,有人称其为“百万马可”,意思是吹牛大王。研究者的疑点之一是,既然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说其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器重,那么为什么在中国的史料里找不到踪迹?

杨志玖做了这一研究领域的“哥伦布”,在《永乐大典》里发现了“新大陆”。这部明代编纂的卷帙浩繁的类书,历经兵燹之灾,仅存数百卷。流落日本得以保留下来的那部分,恰好有第19418卷,曾经影印,杨志玖读的是排印本。其所载元代至元二十七年(1290)的一篇奏章,上有波斯使臣兀鲁鲁、阿必失呵、火者三个难记的音译名字,被很多中外学者漠然视之,杨志玖却敏锐地看到其巨大的史学价值。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有记,波斯君主遣使向元室求婚,马可·波罗陪同三位使臣和蒙古公主,由泉州起航到波斯,从而结束了旅居中国的生活。游记所记三使臣的名字,在《永乐大典》载录的元朝公文中得到印证。马可·波罗溯“丝绸之路”而来,途经沙州(今敦煌),启碇刺桐港,沿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离去。

历史学研究要靠材料说话,杨先生的《关于马可·波罗离华一段汉文记载》就是明证,尽管这篇文章并未能终结相关的讨论。上世纪80年代,中、意、美三国合作拍摄摄影《马可·波罗》,英国有位学者提出质疑。我向杨先生提及此事,先生说,是的,那篇文章发表在《泰晤士报》的《中国增刊》,我们学校有那天的《泰晤士报》,但只有正版,师大历史系一位同志到伦敦时,找到了原刊版面。杨先生讲,马可可是商人,在中国走了一些地方,为做买卖。如果同时充当朝廷耳目,搜集舆情,就可以讲是皇帝派出的。马可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,可能是陪元世祖忽必烈说话的,其人年轻帅气招人喜欢,又是外国人。先生说,期待史料的新发掘,推进马可·波罗研究。

那时,我正为报纸写“学林”记”专栏,便在《永乐大典》里发现马可·波罗足迹》为题写就一篇小文。后来,杨志玖先生出版专著《马可·波罗在中国》,将这篇千字小文作为附录收入书中。

洁上丛话

敦煌壁画 国之瑰宝

邮缘(十二)

中国邮政《敦煌壁画》邮票有一枚《唐·伎乐》。我制作的发行首日明信片,钢笔题字:“敦煌壁画,国之瑰宝。杨志玖94.8.17”。杨先生的学界任职,有中国唐史学会顾问一项。明信片贴拙诗剪报:“风落着长安的曲谱,在莫高窟洞壁轻轻一拂,流行色与流行乐融成画卷,又被岁月的酒窖储得很古……”

杨志玖(1915—2002),字佩之,回族,山东淄博周村人。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史学系、文科研究所,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,南开大学教员,中研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(借调)。抗战后回南开大学,曾任历史系教授、博导,兼任中国唐史学会顾问、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、中国海外交通史学会顾问。主要专著有《隋唐五代史纲要》《元史三论》《马可·波罗在中国》《元代回族史稿》。

杨志玖先生的治学方向,是19岁考入北大时选定的——生在一个回族家庭,希望研究本民族历史。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,撰写毕业论文《元世祖时代汉法与回回法之冲突》。为此,他没少下“笨功夫”。精读《元史》,通卷标点,为书中未列传的回回人物逐一做卡片;又抄录《元典章》及元人文集中的史料,也没忽略同时代的外国人看中国的经典文本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,这部游记向西方介绍东方文明和物产,被誉为“世界第一奇书”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论文尚未完成,一篇“副产品”《关于马可·波罗离华一段汉文